

# 八八水災過後家屋意義與 情感連結經驗之探究

## After the Typhoon Morakot: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rocesses of home meaning and identification

洪雅琴<sup>1</sup>  
Ya-Chin Hung<sup>1</sup>

###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八八水災之後災民對於家屋意義與認同的轉變經驗，筆者於八八災後長期追蹤關懷佳冬地區災民，發現欲理解災民的災難創傷與心理重建經驗，需將當地以養殖漁業為主的社會經濟脈絡與歷史文化背景納入考慮。佳冬災區是全台灣地層下陷最嚴重、地勢最低窪，每年逢颱必淹的地方，長久以來居民早已生活在淹水的場景與結構之中。八八水災發生後，筆者帶領文化心輔志工團參與災民安置中心的災童陪伴與輔導工作，進而投入佳冬災區災民的後續追蹤關懷與田野工作至今已超過三年。本文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為例，以民族誌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結果發現：災區村莊裡的房舍塌陷程度不一，以及房屋地基高低落差極大；就心理意義而言，佳冬地區早已是沈沒之鄉，災難早已存在，但卻長期受到忽視和遺忘；八八水災正體現了這樣的危害；八八水災的發生不僅造成了災民生命安全的威脅感與存有的危機感，並且對災民的家屋意象與空間記憶產生鉅大衝擊。

**關鍵詞：**八八水災、家屋意義、認同

### 壹、前言

台灣中南部地區特有的地層下陷問題，以沿海養殖漁業為主的屏東縣佳冬鄉的情況最為嚴重；光是近25年來累積下陷程度即達到2.26公尺，為全台灣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地區（內政部營建署，2003）。八八水災帶來的百年雨量，加上人為的海堤失修問題，對佳冬災區造成前所未有的

嚴重災情（屏東縣政府研考處，2009）。八八水災發生後，筆者帶領文化心輔志工團參與災民安置中心的災童陪伴與輔導工作，進而投入佳冬災區災民的後續追蹤關懷與田野工作至今已超過三年。筆者進駐佳冬塽豐災區時，迎面而來的是村莊裡塌陷程度不一的房舍，以及高低落差極大的房屋地基。部分房屋地基的嚴重塌陷，使得原本的一樓只剩下半層樓高，甚至一樓完全埋入地底，僅剩下二樓變更為一樓使

<sup>1</sup>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洪雅琴，（112）台北市北投區義理街38號4樓，Email：drhungyachin@gmail.com

用。新蓋的房舍地基高達半層到一層樓高，或一樓空蕩蕩的，僅作為倉庫與停車之用。有些家戶花費鉅資把整棟房屋拉高一整層樓；就連剛落成的媽祖廟高達四米以上的一樓完全是空的，以確保媽祖神像絕對不會減頂。

Heidegger (1971) 提到：棲居的本質是提供我們安全的庇護之所，讓人在不受威脅的自由之境中保持自在，並護衛萬物於其本質之中。然而，台灣長年來以經濟掛帥為主的政經氛圍，非但未能鼓勵國土保護與生態保育，反而造成佳冬沿海養殖漁業地區的超限開發。短短二、三十年間超抽地下水，造成嚴重地層下陷；如今海岸線節節逼近，沿海村莊地基坍塌，佳冬災區所有房舍、建築物嚴重塌陷。原來，「人定勝天」僅是一時的自我感覺良好，佳冬居民和這片他們世代賴以為生的大海相處已經失去平衡，八八水災則是大自然未知力量的示現。佳冬災區地層下陷現象持續惡化是不可逆的問題，也不會因為災區重建告一段落而有所改善，因此，我們無法抱持著過於天真樂觀的態度來面對災後心理重建問題。畢恆達 (2000b) 強調家屋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當家屋遭到破壞時，原來習以為常、理所當然而未加以反省的家屋意義，也會因此產生變化。本文將以八八水災佳冬災區為例，以民族誌參與觀察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探討八八水災對災民家屋意義的衝擊，並了解災民對家屋情感連結如何隨著災難的發生而改變。

## 貳、家屋意義的探討

本段落將先說明家屋的意義與重要性，以及居住者對家屋的情感認同，並說明家屋的構成條件與庇護能力。

## 一、家屋與我：對家屋的認同

家屋空間的使用，記錄了人在其中的生活作息、生活習慣、彼此的記憶與情感。從家屋以外更大的範圍來看，空間的差異記錄了每個族群與社會文化風俗的特殊性，空間不單單只是空間而已，空間是人活動的表現，當人在塑造空間時，空間也在影響著人的行為。由於生活是連續而不可分割的，人在空間裡的活動也是連續而不可能分割的 (王思涵等人, 2000)；人們會對日常生活的居所和執行特定儀式的所在產生依附感，而家屋常是產生最大依附關係的場所，一個安全的地方，界定個體存活的邊界，人們藉由與家屋的依附關係產生熟悉和認同感 (Pollack, 2003)。家屋讓我們知道我們不僅可以安居於此，還有改變它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藉此建立未來的夢想。個體在家屋中的個人成長與自我認同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不僅是靜態的自我意象反映而已；家屋實現了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性 (Dovey, 1985)。家屋意象不僅是實質空間意涵，同時也是一種象徵時間，在這樣的時空傳統裡，映射著家屋意義與個人認同的交互辯證關係；當創傷事件發生時，則可能傷害到個體對家屋的依附、歸屬和認同 (林耀盛、吳英璋, 2004)。

## 二、家屋的構成條件與庇護能力

Bachelard (2003/1957) 在「空間詩學」一書中，描繪了家屋是如何投身到狂風暴雨當中，公然反抗大自然的憤怒：「在面對風暴和颶風的敵意獸性時，家屋所具有的護持和抵抗價值也就轉化為人性的價值。家屋取得了人類身體所具有的物理能量和精神能量，在傾盆大雨中，家屋鼓著背、挺著腰。當它

被情勢所逼，不得不再狂風中彎腰時，它卻很有信心地即時再挺直腰，一概否認任何暫時的挫敗（頁115-116）。」

Bachelard（2003/1957）他認為昂利傅斯科的「退引之所」一文，表達出了居住者對家屋的深深感激，它來自於家屋所實際發生的保護作用。

「家屋正在勇敢的戰鬥，首先它發出聲音表示抱怨，最可怕的陣陣強風正同時從四面發方攻擊著它，帶著明顯的憎恨和如此狂暴的怒吼，有時會讓我不寒而慄。然而，家屋挺立著。打從風暴一開始，疾言厲色的風就已經在攻擊屋頂，想把它掀開，把要把它打退，想要把它撕成碎片……但柔韌的家屋依舊彎著腰，抵抗著這隻野獸。家屋無疑正運用牢不可破的根系……家屋的存有已變成了人，對風暴絲毫不讓步，我在當中讓我的身體得到庇護。家屋緊緊護持著我，……在暴風雨之夜，家屋的確是我的母親（轉引自Bachelard, 2003/1957，頁115）。」

上述詩文反映出：人和家屋的情感依附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透過事件的展演，人們維持其對家屋的情感依附，即便透過重新裝潢或汰換傢俱改變了家屋的樣貌，仍然維持甚至是強化了人們對家屋的情感依附。然而，當人們無法改變家屋的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或認同的目標時，人們對家屋的情感依附也可能因此消退掉（Brown & Perkins, 1992）。即便在極其親切溫馨又安全的家屋之中，活在災難時代的我們，也難免擔心地震、火災或水災的降臨。在此極端情況下，家屋環境受到外在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人們必須花費鉅大的心力方能維持生活的基本穩定度、連續性與安全感時，此時，家屋的意義以及個人的自我認同也將受到傷害。

## 參、八八水災對家屋意義的衝擊

本段落將先說明八八水災導致許多佳冬居民的家屋慘遭滅頂，進而對家屋意義產生衝擊，並探討八八水災過後，佳冬災民對家屋意象所產生的不安全感與矛盾心理。

### 一、八八水災沖毀家屋的庇護形象

2009年八月七日當天早晨七點多的時間，驚人的雨量加上堤防潰堤，佳冬鄉沿海的塹豐、塹焰與羌園等村，在短短十幾分鐘的時間內，水淹到一樓頂或二樓凶險處境（中央社，2009.08.13；客家新聞台，2009.08.28）。多數村民為了逃生，來不及攜帶任何飲水食物與財物證件等，許多倖存者挨餓等待國軍救援長達兩三天時間（自由時報，2009.08.08；華視新聞，2009.08.13）。在災難衝擊的當下，災民擁有不同的家屋條件，其庇護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家屋的安全性是有差異性、相對性及比較性的。例如：災民住家的地勢高低，住家為平房或樓房，災民會不會游泳，自家是否備有竹筏，是否有儲備糧食、是否熟悉地勢、身體的老弱殘疾與否，救援人力物資是否容易抵達等，直接影響到災民對水災創傷暴露程度的主觀認定。村民之中，男性一般從事漁業工作，諳水性，能免於滅頂、並具備第一線的救災能力；多數老弱婦孺則只僅能逃至自家或鄰近安全處，等待救援。以筆者三年多以來在佳冬災區最熟悉的田野工作地點塹豐村來說，該村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居住於平房，八八水災對他們而言意味著瞬間滅頂的可怕災難，他們需即刻逃離家門，尋求鄰近親友樓房或廟宇、

小學等庇護，所有身家財產瞬間幾乎化為烏有。然而，其他有二、三樓住屋的災民，他們滅頂的風險較低，但驚恐的程度不見得較低。

佳冬災區沒有任何人在這場超級水災中罹難，災民們認為沒有人在這場水災中罹難實在是因為水災衝擊發生在早上七點多，假如八八水災發生在半夜，可能將死傷無數。阿公、阿嬤們紛紛提到：「沒二樓可以逃生阿，蓋恐怖！」「如果晚上不知要死多少人……老年人沒辦法逃生，」「如果是半夜的話那會死一半的人喔！那水淹來，你就跑不掉了。」村民們深信他們能夠死裡逃生，都是因為「媽祖顯靈」、「天佑塭豐村」。這樣的結果對佳冬災區到底是福還是禍？首先，沒有人命損失，使得佳冬災區獲得的救災資源與社會關注顯得薄弱；其次是水災畢竟不需要像地震一樣需要百年能量的累積，水災是氣候變遷與人類過度開發之下的產物，問題只會每況愈下而已。顯而易見的，八八水災佳冬災區存在著被低估的風險以及被忽略的傷口。

## 二、空間的殘存：只剩下家的軀殼

「災民逃離或撤離早已淹沒的家園之後，暫時被安置於佳冬鄉公所，輾轉安置於佳冬農校，最後由枋山鄉加祿堂營區收容，人數約一千多人；另外一、兩千人由親戚朋友接濟，或暫時在外租屋居住。安置期間，多數災民利用白天返回家園清理打掃，並於中秋節前後陸續返回家園。災區一樓民宅的主要家具、電器以及汽機車流失毀損殆盡，財物損失估計每戶約30至60萬左右（田野日誌，2009.9.19）。」

廟婆、陳先生與小嘉哥哥都不約而同提到：「水災過後，這裡沒有水、沒有電、只有惡臭、淤泥，殘破的家具、整個房子都塞滿了爛土、死魚，宛如死城。」災後兩個月，災區魚腥味與臭味有消退的跡象，然而多數災民家屋內的家具不是被沖走，就是毀壞不堪使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清理家園，清除淤泥、消毒，災區環境仍然混亂不堪；少部分人已經回到村莊居住，但多數災民仍然回不去。很多人擔心災民在安置中心住久了、被照顧習慣了，會開始產生惰性；人們甚至開始批評災民變得依賴與不負責任，擔心災民因此喪失生存能力等。然而，我們在追蹤關懷過程中，傾聽到災民有不得不在安置中心的苦衷。例如：

小蕙媽媽：我們並不是不想回家、我們也不想在這邊（指安置中心）白吃白住，我們有我們的困難，家裡又還沒清理好……。

美花阿嬤說：「我們還是選擇讓孫子們回到收容中心住，因為這裡（指村子裡）的生活非常不方便，根本無法煮飯、洗澡、睡覺等等……，重點是比較衛生啦。」

阿智說：「雖然家裡都清乾淨了，也可以住了，但是我有嚴重的過敏，我無法忍受村子裡的氣味，我無法住在那裏（田野日誌，2009.9.19）。」

的確，空蕩蕩的家不算是真正的家，那只是一個軀殼，一個家還要有桌椅、熱水器、瓦斯爐、冰箱、床、被子和門窗等等，才能夠維持起碼的家庭運作；人們才有可能生活在其中，感受到家屋的舒適便利和安全。甚而，一個家通常還會有電視、電腦、窗簾、家人合照和旅遊紀念品的擺設等，記錄著一個家庭的生活點滴和歷史，這也正是人們對家屋產生情感依附的主要原因。我們

不難了解為何八八水災發生之後，災民需要花費長達半年時間；亦即農曆過年時才逐漸慢慢步上軌道。

### 三、家屋成為災難的提醒物

災難發生一段時間之後，災難衝擊可能悄悄轉化為一種創傷的心理符號及災難提醒，相關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線索，都可能促成對於災難的記憶和警覺；只要是能提醒大家聯想起災難經驗的種種情境、景象或聲音，都將會引起壓力反應。Myers（1994）將之稱為倖存者的「觸發反應（trigger reactions）」。李維庭（2000）提到災難的「心理輻射」則是類似的概念，他說：「對於目擊及經驗到災難的人們來說，當一個災難現場形成之後所持續散發在心理層面的影響。就如同災難現場做為一種輻射源，愈鄰近現場的人們，愈容易持續接收到有關災難事件的種種，也就愈容易受到災難事件的後續影響。（頁248）」。八八水災從災難現場逃出的佳冬災民，返回家園再度置身於這個心理災難現場，衝擊了災民對家屋概念的根本認識，也勢必造成災民對家屋意義的解構和重構。過去保障災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家屋，如今成為了災民災難心理輻射的壓力源，災民面對家園重建的心情頗為矛盾。

多數災民返家之後家徒四壁，門窗、牆壁也被沖毀掉，所謂的家屋是不堪居住的。政府與民間機構補助額約十餘萬元，慈善團體或企業亦捐贈了各式電器家具，但並不敷使用；災民只得重頭開始建設家屋的硬體設施。「災後一年內，我們造訪災區家庭共四次，看到多數家庭逐漸增添生活起居用的各式電器家具，災民客廳常擺放的是慈善單位捐贈的白色塑膠桌椅一組，之後看見廚

房擺設了聯電捐贈的木製餐桌椅一組，質感好得許多，一貫道捐贈的瓦斯爐、還有其他慈善團體捐贈大型冰箱、床組等等。另外也常見到災民親友送他們的舊家具，以及經歷水災已經龜裂毀損的桌椅衣櫃等（田野日誌，20100809）。」面對災後居家環境條件的重建情形，災民心情上是相當矛盾的：災民一方面慶幸著能保存少數尚堪使用的家具電器，也感恩著親友與社會善心人士的愛心協助；然而，水災過後，災民舉目所見的所有構成家屋條件的種種環境設施，同時也成為了災民的「災難的提醒物」。災後兩年，添購新的平面電視的張阿公還特別強調：「這是外地家電行特別便宜拍賣給佳冬八八受災戶的。」即便三年之後，我們看到多數災民客廳廚房的陳設仍沒有太多改變。主要是災區漁業發展大幅衰退，多數災民經濟條件困頓，沒有太多能力改善家庭硬體設備；同時，災民每年颱風雨季仍是膽顫心驚，隨時準備水災到來與逃命，這些愛心捐贈家具電器若被水災沖走了，剝奪感不那麼強烈，感覺也會好受些。

### 肆、災後失落的安全感

#### 一、隨時準備好逃命的災民

村子裡的年輕人說：「很諷刺的，這裡常常不斷地在鋪新路、加高地基，重新粉刷房子，看起來很像新的。」佳冬災區獨特的家屋面貌與空間意象不僅帶給筆者強大的視覺震撼，並伴隨著相當程度的扭曲感與超現實感。然而，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的在地村民早已習於一切，彷彿無感。過去以來，佳冬沿海看似堅固無比的人造海堤，似乎成功地隱藏了村民住在海底世界的真相；然

而，村民們真的完全麻木而無感嗎？一位阿嬤告訴筆者：「二、三十年前，我們到海邊玩，還得走十幾分鐘的路程才行！哪知道現在海岸線比房子足足高了兩層樓。」「看著海平面比自己家裡整整高了兩層樓，不知道怎麼安心睡覺？」阿嬤如實地說出所有災民內心最深的恐懼。的確，這個恐怖的畫面，只消站在海堤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原來，第一次進入村莊的筆者也曾經深深被震撼過，只是八八水災帶來的百年雨量終於衝破海堤，海水迅速淹沒整個村莊，也讓村莊安全的幻覺一夕破滅。

許多倖存者會說，災難發生的季節再度來臨時，會出現坐立不安及恐懼的感覺（Myers, 1994），此即災難週年效應。八八災後，每年颱風季節一到，佳冬災民們又神經繃緊了起來；豪大雨特報更是讓他們不知所措。許多家裡只有一樓的災民們，其實都非常的擔心，也擬定了不同的逃亡計畫，例如：

小蕙媽媽說：「再下雨，就跑去對面房邊的鄰居家，他們家有三樓比較高啊！」

阿信說：「準備好了游泳圈，跑去對面他們家比較高。」

劉先生說：「下大雨就準備開車先離開這裡。」

我們舉目可見，八八災後政府在佳冬災區每一家戶裝置防水閘門，許多災民都自備救生衣與救生圈；多數災民認知到：全力配合政府公告，該撤村就撤村。例如：為了因應八八災後隨之而來的芭瑪颱風，展開前所未有的撤村行動；這是他們為自己留根鄉土的決定、為自己的人身安全所盡的基本責任。只是，佳冬災區海岸線比家屋高一兩層樓，連阿公阿嬤們或是小朋友們都明白：「這裡是危險的，得隨時準備逃離才行。」家屋的安全與情感認同始終在

天平的兩個極端擺盪著，凸顯了災民離開或留下的兩難處境；如何克服留根鄉土的不安全感，仍是多數佳冬災民內心的痛處。

## 二、弱勢災民的相對剝奪與創傷

重建過程中的佳冬災區，許多家庭致力於墊高地基，映入眼簾的家屋面貌與空間意象也開始產生扭曲質變；只是，經過墊高工程之後的家屋，也無法保證不再淹水。對災民來說，八八水災帶來一種對人性更嚴酷的考驗：「相對剝奪與創傷的現象」。有錢人家可以不斷墊高地基，或是直接改建樓房；甚至直接把一樓當做停車場。相對之下，沒有錢的人家，屋子就顯得越來越矮小，而墊高地基的平房，只剩下三分之二高度，窗戶距離地面不遠，看來如同好萊塢電影「魔戒」裡面哈比人住的屋子一般，令人懷疑這樣的房子怎麼住呢？筆者於追蹤關懷的前一兩年，內心經常嘀咕著：「這裡這麼不安全，難道你們不會想要離開嗎？」於是，最典型的對話就出現了，筆者問：「會考慮想要搬家嗎？」許多阿嬤回答：「要搬去哪裡？」接著，筆者深感罪咎地安靜下來。

原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資源和選擇權。有能力走的人，捨不得走，拼命墊高他們的房子。沒有能力墊高房子的人，渴望逃離這裡，卻只能逆來順受，無法有積極作為。陳阿嬤說她八八之後晚上都會做惡夢，想說：「『天啊，水還淹著，』趕快清醒過來，醒來後心臟還一直砰砰跳，」「回想到當時後逃到對面鄰居家二樓，看著海水一直往自己家房子淹上來，眼淚就會忍不著一直流出來，我這窮人家……，」八八之後，每年夏天颱風季

節來襲前夕，阿嬤更是坐如針氈，但是當我們詢問阿嬤是否想過要搬出去住，阿嬤苦笑著說：「若是有錢，早就搬出去住外面了，也不會住這邊。」一場八八水災的肆虐，沖垮了賴阿嬤家雙併平房中的一半，阿嬤無耐的說：「一般牆壁是用雙層磚塊來蓋，但是我們當初加蓋另一棟房舍時，經濟能力不好，僅用單層磚塊蓋上來，誰知道會遇到這樣大的水災……」由於家裡人丁旺盛，為了全家人的立錐之地，賴阿嬤拿出僅存的五十萬元，卻僅夠原地重建另一半的雙併平房，而無法蓋兩層樓高，安全一點的房子。

從上述可看：建築物本身的高低，某程度也代表了居民之間資源的差異性，有錢的漁塭業者可以選擇搬離災區或是努力墊高家屋一樓，安全無虞；然而，世代居住於此地，經濟弱勢或家住平房的災民即使想離開，也離開不了；而這正是災區經濟弱勢者的悲歌。

## 伍、八八災後家屋意義與情感連結經驗的轉變

佳冬地區過去以來超限開發所造成的低窪地勢，使該災區在八八水災過後漫長的災後重建過程中，伴隨著不可知的災難預期現象。當家屋已經被沖毀或是證明其喪失庇護棲居者的能力時，八八水災佳冬災民處於一種「雙重束縛」的存有處境，亦即：受苦者努力要回復「正常的生活」；然而，歷經生命威脅事件後，要「如同從前」在本體上已是不可能（Bar-On, 1999）。災後，災民不論是離開或留下都是問題。

### 一、離開或留下的兩難困境

筆者觀察到：佳冬災民在家屋歷經

浩劫之後，因嚴重地層下陷所帶來家屋空間意象的矛盾與複雜性，最容易使災民感到無力；八八水災之後，災民無論搬或不搬都是問題。災區青壯人口多半渴望有能力搬離這裡，離開或許可以確保家屋的安全性，然而，離開之後，可能不僅失去原本的生計能力，也失去原本的社區人際網路；即便換來了安全的住所，很有可能會變成情感與人際上的空殼。只是，因為海岸線比家屋高一兩層樓，選擇留根鄉土的災民，安全感問題仍然存在。好不容易重建家園，生活看似逐漸步入軌道的佳冬災民，也如同好茶部落魯凱族人面臨遷村與否的矛盾心情：「再住下去看似可行，卻有可能在某一個颱風或某一場暴雨之後，淪為那種萬劫不復的狀態，這樣的風險是不是能夠承受呢？（全國成、楊雅祺，2012，頁9）」佳冬災民同樣處於這種且走且瞧、莫可奈何的心理狀態之下；災民對於留下或搬離的矛盾心理，勢必逐漸拉扯、撕裂災民心中的家屋意義與情感認同。一旦家園易地重建，將改變災民、家人和他者的關係，生活經驗的綿密性突然轟一聲地斷裂掉，災民需要適應新環境，且往往是一個切斷家族情感和歸屬的新環境（林耀盛、吳英璋，2004）。

### 二、災民對家屋情感連結的轉變

畢恆達（2000）以林肯大郡為例說明：災害受創者過去的生活世界中，住屋的擁有權提供了建構家屋的可能性，不再需要寄人籬下、不再需要短期搬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住宅空間本身，成為籌設未來的基地。但是災難不僅破壞了住宅空間本身，也讓追求自我住宅的神話破滅。對受災戶而言，他

們經驗到對於家屋未來性的不確定：颱風或者地震再來時，會不會再發生災變？有沒有集體遷村的可能，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導致居民對基本的家屋認同與情感都變得困惑，例如：「我家很亂，已經沒有心情整理」「好像有沒有整理都無所謂」。災難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與脆弱，有時會讓災民失去計畫未來的能力（Edestein, 1998; 轉引自畢恆達，2000）。例如：「我們看見一年前送給陳阿嬤的組合櫃發霉得嚴重，打開封閉已久的房間，發現房間的床鋪家具全部都發霉了；整個家屋環境呈現混亂的狀態，其家庭重建狀況相當糟糕，看到眼前這一幕景象，我們不免心頭一涼（田野日誌，20100809）。」對災後持續情緒低落的陳阿嬤而言，外在看得到的物資無法幫上她什麼忙，因為她根本沒有動力和心思去利用物資改善生活品質和居家環境，惡劣的家屋環境間接反映出她心理上的混亂與創傷。

人們對家屋的情感依附整合了人的自我界定與認同，而情感依附的破壞就可能危及個人的自我認同，家屋及其他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傳達了「我是誰？」的訊息，家屋遭受破壞，個人價值也受到影響（畢恆達，2000）。就像阿嬤們常說：「如果當初房子再墊高一點，今天的損失就不會這麼慘。」「早知道會淹這麼高，就再墊高一點地基就好了。」「如果今天不要買這棟房子，搬去高雄住的話就不會遇到這災難了。」人與家屋之間原有的地緣性依附，隨著災難的發生而失落，並且轉化為一種人與家屋的疏離關係。許多受災父母因為無法提供給孩子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而感覺到罪咎和自責。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

方。原本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園是居民們奮鬥的夢想，因為災難毀壞了家園，原本擁有的家屋，變成了一種負債，除了災後生活困頓之外，有些還得為尚未繳完房貸而煩惱。擁有家屋的成就感，都隨著災難的發生而失去（畢恆達，2000）。

### 三、重新打造家屋記憶與傳說

Miller（1998）強調：在政府、民間與個人的努力下，重建的新措施或方案陸續出爐上路，家園與自然人文景觀逐漸恢復，將重新為未來、生活注入希望感。如果重建的步伐緩慢，受創者往往會出現更激烈的反彈情緒，甚至造成二度傷害。家屋重建的過程，不只是外在硬體設施的回復，及其生活現況需求的滿足。理想的家屋重建應能喚起居民心中對過去美好記憶的空間，能滿足其需求及想像（王思涵等人，2000）。八八水災佳冬災民也逐漸體會每日生活還是要正常過，這場水災沖刷掉有形的建築和家具，以及有歷史情感記憶的家具和照片等，這些失落感只能哀悼；但至少人還在，可以重新打造記憶，包括了有形的和無形的對這個家屋的記憶與傳說，這正是家屋存在的可貴之處，家屋意象帶給人的存有感。只有在家，才有心安的感覺；家屋聚集了曾經有過的一切；不然，再好的房子也只是物質與空殼，沒有意義和情感。

小嘉家庭是我們追蹤訪談對象之一，第二次拜訪，小嘉的爸爸很快就可以認出我們，而阿嬤卻用一種非常疑惑的眼神看著我們，似乎不認識、不記得了！我們趕快拿出已經幫他們裱框的家庭合照，阿嬤一看到照片，整個笑容就出現了（田野日誌，20100131）。

照片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田野紀錄形式，對我們追蹤關懷的家庭而言，卻是一種心理與情感上的資源。災民所有記錄過去生活點點滴滴記憶的照片影音或私人珍藏的物品等，可能都已被水災給沖刷殆盡；對於正處於被剝奪、匱乏狀態的災民而言，拿到家庭合照是一種「重新擁有」生命記憶與軌跡的象徵。照片並非實用的物資，但卻能夠讓阿嬤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愉悅感與安慰；照片不僅拉近我們與災民之間的距離，更是聯繫災民過去經驗與現在生活之間的橋樑。

由上述可見：八八水災之後，災民仍可牢牢留住記憶中的家、熟悉的家，一點一滴的重新打造，因為災民對家屋的記憶與傳說沒有流失，家屋遺產仍在，多數災民因此可以承載災難創傷之慟，災民對家屋的情感依附與認同鼓舞了後續家園重建的動力，並在三年多時間逐漸恢復。

## 陸、結語

就心理意義而言，佳冬地區早已是沈沒之鄉，災難早已存在，但卻長期受到忽視和遺忘；八八水災正體現了這樣的危害；顯然，我們不能僅在災難當頭的危機時刻才重視災難創傷議題。過去我們總認為家屋是最安全舒適的置身所在與棲居之地，自然難以認知與想像佳冬災民居家環境的安全舉措與考量，竟是如此草木皆兵，充滿肅殺之氣。此際，災民對於家屋意義與認同重新進行反思，藉以面對災民生存上的威脅感與存有的危機感問題，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希望透過本文章的拋磚引玉，帶領讀者一起思考：重大災難過後，災民將何去何從的嚴肅問題。

## 參考文獻

- 王思涵、江建國、江柏瑞、李宇中、許聖倫、陳紀樺、陳進男、褚侯森、張璋真、曾瓊畿、鄭鈺琳（2000）。空間的故事：參與式空間劇本寫作——以921地震災后國姓老街家屋重建為例。**城市與設計學報**，11，295-312。
- 內政部營建署（2003）。**國土城鄉防災綱要計畫**。取自<http://ncdr.nat.gov.tw/91conf/cd/C/CR02.pdf>
- 全國成、楊雅祺（2012）。**從離鄉到打造一個家：從魯凱族好茶部落遷村歷程與災後復原為例**。發表於2012年「邁向優質服務：社會工作專業的對話與省思」研討會。主辦人：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地點：台鐵大樓演藝廳、第一會議室。
- 李維庭（2000）。經歷九二一：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應用心理學研究**，6，213-250。
- 林耀盛、吳英璋（2004）。雙重變奏曲：探究「九二一」地震「失親家毀」受創者之心理經驗現象。**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2)，1-41。
- 屏東縣政府研考處（2009）。**屏東縣莫拉克颱風災害專題報告**。取自<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31/16.pdf>
- 畢恆達（2000）。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應用心理研究**，8，57-82。
- Bachelard, Gaston (1957/2003).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見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
- Bar-On, D. (1999).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Hungar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B. B. & Perkins, D. D. (1992).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M.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2*, 279-304. New York: Plenum Press.
- Dovey, K. (1985). Home and Homeless. In Altman, I. & Werner, C. M. (Eds.). *Home environme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3-64.
- Heidegger, M. (1971)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nd introd. By Hofstadter, A., New York: Harper & Row, 145-161.
- Myers, D. (1994). *Disaster response and recovery: A handbook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California: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
- Miller, L. M. (1998). *Shocks to the system: Psychotherapy of traumatic disability syndrome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Norris, F. H., & Kaniasty, K. (1996).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imes of stress: 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deterrenc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98-511.
- Norris, F. H., & Uhl, G. (1993). Chronic stress as a mediator of acute stress: the case if Hurricane Hugo.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3*, 1263-1284.
- Pollack, C. E. (2003). Burial at Srebrenica: Linking place and traum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6*, 793-801.